



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張 萍編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农村兩条道路的斗争，在全国实现合作化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問題上虽已算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并没有結束，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改变，并没有完全解决經濟綫上的問題，特别是沒有完全解决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問題。因此，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在政治思想上乃至經濟制度上的兩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着。农村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和斗争，一部分表现为敌我矛盾，如資产階級右派对农业合作化制度的攻击，农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即表现为农村广大的貧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資本主义傾向之間的矛盾和斗争。（当然，这并不是說农村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属于兩条道路的矛盾。有的属于兩条道路斗争的性質，也有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这种性質的。）

还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間，毛主席就作了这样的分析：“在中国，富农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們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們占农村人口20—30%。在中国的农村中，兩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貧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并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資本主义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們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長的时期內，稍微放松了对

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資本主义傾向就会泛濫起来。”（見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誰說鷄毛不能上天”和“必須对資本主义傾向作坚决的斗争”二文的按語。）

一些具有严重資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他們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散布資本主义思想。他們說合作社的坏話，詆毀党的各項政策，挑撥干部和社員的关系，甚至煽动落后社員退社；他們反对合作社按照国家計劃的要求組織生产，反对合作社有計劃地进行基本建設，而主張“什么賺錢多就种什么”；他們反对合作社以集体生产为主，反对不断扩大社的集体生产，要求无限制地扩大私人副業；他們反对合作社积极地扩大公共积累，主張“不扣全分”。总之，他們总是想按照自己的要求来改变合作社的面貌，改变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方向。

經過社会主义大辯論之后，农村的情况已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資本主义思想已經受到有力的批判，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已經受到打击，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已經形成，成績是很显著的。但是，根深蒂固的資本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就彻底清除干净的；資本主义自发傾向还会在生产、办社过程中，随时随地与我們进行頑强的斗争。这种斗争將存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因此，我們必須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細致、更加深入具体地进行兩条道路的斗争，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資本主义思想在农民群众中失掉市場，才能清除資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才能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生产勁头更加高漲。才能使合作化制度进一步巩固，更好地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的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目 录

前 言

一、怎样認識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 (一)发展农业的兩条道路…………… (1)
- (二)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5)
- (三)必須分清的几个問題…………… (18)

二、在粮食問題上的斗争

- (一)粮食問題上的斗争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兩条道路的斗争…………… (29)
- (二)农民的用粮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35)
- (三)必須坚持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实行以“丰
补歉”的方針…………… (44)

三、怎样看待工农关系

- (一)工农业互相支援、工农联盟是建設社会主义
的基本保証…………… (50)
- (二)分清工农关系問題上的大是大非,进一步
巩固工农联盟…………… (53)

四、深入开展兩条道路的斗争,巩固合作化制度, 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

- (一)必須坚持計划生产,坚持以增产粮食为主,
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經營的方針…………… (72)
- (二)巩固农业社的关键,在于积极发展集体經濟… (74)
- (三)必須积极地扩大农业社的公共积累…………… (80)
- (四)必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决贯彻党在农村中
的階級政策…………… (86)
- (五)克服右傾保守思想,在农业生产战綫上跃进
再跃进…………… (93)

一、怎样認識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一)发展农业的兩条道路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占居統治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到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9%的貧农、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总共只占有20%到30%的土地。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富农、投机商人、高利貸者互相結合起来，殘酷地剝削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耕地面积年年縮小，收成降低，生产停滯，許多地方連年遭受飢荒，广大劳动农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飽肚的生活，政治上更是毫无权利可言。每当遇到灾荒，广大农村更呈現出一副极为悲慘的景象。“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野有餓莩”、“易子而食”，这是历史記載上所常見的詞句。在国民党反动統治的1920年到1936年，据不完全的記載，16年中死于逃荒的人口就达到1,835万人。1943年到1944年，仅河南省（全省人口3,000万）便有1,000万灾民，有200万到300万人死于飢饉，并有200万到300万灾民被迫流落他乡。

中国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終結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統治；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又彻底地摧毁了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使全国約有3亿以上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批的其他生产資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納

600亿斤地租的沉重負担，以及各种超經濟的剝削。从此，封建的經濟基础被連根鏟除了，广大劳动农民由地主階級的奴隶、牛馬变成了农村的統治者、土地的主人。因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漲，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我国的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分的水平，农民生活也一年比一年提高。許多原来的貧农和雇农，大部分上升为中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成为农村占多数的阶层。

但是，小农經濟本身具有二重性。他們一方面可以在党的領導下，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們的自发趋向是走向資本主义。同时，他們的經濟力量單薄，很不稳定，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由于疾病、衰老、死亡等其他困难，就会陷于貧困，甚至破产。只有少数富裕戶，由于他們的底子厚，資金足，劳力强，便可以乘人之危，放高利貸，購買土地，雇工剝削，最后又变成地主、富农。因此，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的階級关系，也随着开始了新的分化，农村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兩条道路的斗争：或是发展社会主义，或是发展資本主义？而且，随着农村經濟的恢复和发展，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也会愈来愈尖銳。

农业发展的資本主义道路，就是使少数“幸运儿”依靠剝削致富，上升为富农，絕大多数农民又日益走上貧困破产的道路。如果广大农民按这条道路走去，不但他們的生活仍然会很貧困，无力扩大再生产，而且他們在土地改革时所分得的小块土地，所建立起来的小家园，也会好景不常，被迫为富农、新兴的地主所掠夺过去。同时，国家也会因农业生产的落后，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和原料，工业品也会找不到銷路。这样下去，工业化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无法建成。

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合作化的道路。农民们按照这一条道路走去，就能依靠集体的力量，按照“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创造更多的财富；就能采用新的农具和耕作技术，大规模地进行生产建设，大大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业社和社员的收入；就能制订较长远的规划，改造自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使原来落后的农村变成富裕幸福、有文化、讲卫生、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有了农业社，鳏、寡、孤、独也能得到照顾。因此，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小农经济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使全体农民都富裕起来，使农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工业化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要积极地教育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

由于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地响应了党的号召，迫切地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到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的农村中形成了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社的农户达到1亿2千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一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8%。因此，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组织形式。小农经济的农村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但是，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有些在农村工作的人员，曾经认为：在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再也没有阶级斗争了。因而放松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工作，这是完全错误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同时，对于农业合作化、对党在农村实施的各项基本政策，也百般地进行诬蔑。他们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统购统销搞糟了”；他们说：

“共产党进城以后，忘記了农民，”說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已經到了餓死的边缘”；等等。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他們虽然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社，但是，要使这些人从思想到行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还需要一个很長的时期。他們当中的一部分人，仍然不甘心阶级的消灭，总想利用各种时机，进行破坏活动。1957年6月以前，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期間，他們就乘机而起，造謠惑众，破坏合作化，破坏統購統銷，挑撥工农关系，甚至公然企图倒算。

多数富裕中农是愿意同貧农、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数人对参加合作社缺乏思想准备，“随大流”入了社。因此，他們多年养成的旧习惯和新制度难免有矛盾；同时，农业社初办的头几年，一般地說，生产和收入有的也还可能达不到他們原有的水平。因此，一部分富裕中农，就覺得在社里“受拘束”，“吃了亏”，在許多問題上表现了某些动摇，一小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他們不顧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乘某些农村里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空子，利用广大农民残余的小私有者的自私自利、个人投机等落后心理，散布资本主义思想，散布对合作化、統購統銷的不滿情緒，煽动合作社对抗国家政策，从事商业投机，隐瞒产量，甚至鼓动社員退社。这些破坏活动，曾在一部分农民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更加助長了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严重地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

以上这些事实說明：我国农村的合作化虽然已經基本上完成，但是，如果只有經濟上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沒有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农业合作化的制度是不能

巩固的。因此，我們必須从根本上駁斥右派分子对农业社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攻，打击那些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的反革命行动。严肃批判以富裕农民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要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如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問題，粮食的統購統銷問題等等，弄清大是大非。

1957年秋天，在全国农村中展开的群众性的大辯論，實質上也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兩条道路的辯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兩条道路的斗争。

(二) 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有人說：“合作化搞糟了，沒有优越性。”农业合作化究竟有沒有优越性？是搞糟了，还是搞好了呢？根据合作化后几年来的真实情况，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农业合作制度好得很，有巨大的优越性。

首先，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永远消灭了产生阶级分化，阶级剝削的根源，为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和幸福的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各地的許多事实，都是很好的証明：就拿土地买卖为例，在合作化运动开展以前，土地的买卖是逐年增長的；在合作化运动开展以后，走上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土地的天卖逐年减少了；完全实现合作化的地区，土地买卖也就完全停止下来了。根据陈伯达同志在河北、吉林的兩個典型調查材料，充分說明了这一点。

“第一、1955年12月河北省保定專区11个县的統計材料：1949年土地买卖数量为43,890亩，1950年增加为

54,494亩,1951年又增加到115,188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后,1952年减为91,421亩,1953年又减为78,450亩,1954年再减为36,245亩,1955年则减为8,290亩。

第二、1955年11月吉林省扶余县3个村的调查材料:
出卖土地的农户,1950年有7户共卖出11垧;1951年有9户共卖出11.5垧,1952年有11户共卖出14垧。1953年合作化,终止了土地买卖的情况。”(见陈伯达:“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事实也证明:在实现合作化的地方,如果贫苦农民离开了合作化的道路,就又会陷于典田卖地受剥削的境地,两极分化的现象就又会出現。广东省陆丰县1957年所发生的事情是很有说服力的。1956年以来,陆丰县由于在办社工作上有较多的缺点,而一些不法的地主富农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一些具有严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农民也跟着鼓动农民散社、退社。因此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成分的社员,一度迷失了方向,使得许多合作社散了伙,大部分农民都重新倒退到原来单干的老路上。可是闹散社不过几个月,借高利贷、卖青苗、典田、卖田等这些对贫苦农民痛心极了的事情,就又发生了,许多贫农和下中农又重新受到了各种剥削。根据两个区一个大乡的不完全统计,几个月的时间就有851户借了高利贷,43户卖了田地,156户卖了晚造青苗。有些还卖了耕牛,卖了树木。贫农陈舜散社后借了高利贷21元,由于到期无法偿还,债主逼得紧,还准备忍痛卖掉儿子,幸亏被党支部发觉,贷款给他,才避免了骨肉分离。这种现象在散社愈早愈严重的地方,就愈为突出。而从事剥削的是哪一些人呢?据调查,大部分是带头闹退社的富裕农民。例如湖口乡

的富裕农民蔡松双鼓动散社后，馬上放了月息40%（每100元每月利息40元）的高利貸。深埔乡下陈村的合作社則是被富农郑福綿帶头搞垮的，散社后放債的就是他同另一戶富农和一戶富裕中农。相反，坚持在社里的貧农和下中农，他們不但沒有一戶借債，反而生活还有了改善。例如被人称为“貧民尾”的六釋村，有10戶全村最穷的貧农，由于他們依靠了集体的力量，不但沒有一戶借債卖东西，而且，还有8戶能够养猪。陆丰县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說明了，只有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才能使广大的农民群众永远摆脱了典田、卖田、借高利貸等悲慘的命运。有些地方的农民說：合作化可以拔掉子孙万代的穷根。这是对农业合作化制度优越性的最好說明。

农业合作化也使得鰥、寡、孤、独、老、弱的生活获得了保障。在旧社会里，鰥、寡、孤、独、老、弱、殘廢只有死路一条，他們有的病餓而死，有的長年到外面去討飯，冻死在外面，有的因生活无着便上吊自杀。总之在旧社会里，这些人是无依无靠的，活着无人理睬，生病无人照顧，死后无人埋葬，这就是他們在旧社会里的命运。解放后，老弱孤寡同样分得了土地，又加上政府的照顧，生活有了改善。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党的五保（保吃、保穿、保燒、保教、保葬）政策下，使他們的生养死葬更加有了指靠，过着相当于甚至超过一般农民的生活。真正做到了“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鰥寡孤独殘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真正实现了我們的前人不可能做到的幻想。

第二、农业合作社由于实行了集体劳动和統一經營，就能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因而就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具体点說，有如

下几点：

1. 实行統一經營，可以合理地利用土地。可以做到宜林者林，宜农者农，宜牧者牧，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土地的潛力，克服了小农經濟时代分散經營，必須按照自己的吃用习惯来安排生产的限制。如有些农户过去沒有小菜土，便不得不把一小部分水田改为菜土；有些宜种水稻、棉花、花生或其他經濟作物的土地，也因个人需要的限制，不能全部种上水稻、棉花、花生、或其他經濟作物，發揮其潛力；荒山荒地，因管理困难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更多。合作社实行統一經營后，就为克服这些矛盾創造了有利条件，并且更有效地保證了国家种植計劃的全面实现。据許多农业社的調查，由于这样因地种植，一般能提高产量15%。

过去分散經營时，各地农民中都有一部分“种地外行戶”和一部分缺勞力、畜力的孤寡戶，他們所种的土地，每年都是处于“半荒”状态，因而收获都低于同等土質的产量（据河北省河間县的調查，产量約低40%），这些戶在入社后，土地由于統一經營，一般都能达到同等土質地的产量。河北省河間县在全县一千多个农业社中的統計，就有缺乏耕作技术和缺乏勞力的农户9,621戶，有土地105,842亩，按每亩可增产40斤粮食計算，就可增产423万斤。

由于土地統一經營，取消了不少溝壟、地界、田間、地边、地角、墙头等，因而，也扩大了耕地面积。据湖南省湘阴县洞庭圍社的統計，扩社后由于毀掉了400多条田間，扩大了耕地面积15亩，即增产稻谷一万多斤。另外，合作化以后，由于私有制的取消，社与社之間解决了插花地的問題，就能使一部分远地变成近地，每年可节省大批劳动日；并且，还便于更好地加强农

作物的田間管理，增加產量。所以有的農民說：“過去土地是紅花一朵，現在土地是遍地開花。”

2. 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分工分業，還可以更加合理地使用勞力。過去，每一個村子里都有一些年紀較大但還有勞動力的人，因無適當工作而普遍閑着，有些具有某些技術的人不能發揮其特長，婦女一般都是在家搞家務，很少參加生產勞動。合作化後，由於實行了統一經營，就可以實行分工分業，有計劃地發展農、林、漁、牧、副業等多種經濟，合理地安排使用各種各樣的勞力，使男勞動力、女勞動力、強勞動力、弱勞動力、生產技術高和生產技術低的勞動力，都可以合理地得到使用，甚至殘廢的社員，也可以分配適合他們干的適當工作，使每一個能夠勞動的人都能在生產中發揮作用。如湖南省新化縣燎原農業社，在高級合作化以後，由於開展了多種經營，社里年老體弱的人、有各種生產經驗和技術特長的人，都能分配他們干適當的工作，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如分配有燒紅磚技術的人，專門燒紅磚，會種植蔬菜的人，專門種植蔬菜，年老體弱的人喂豬、帶小孩、或干其他輕活。因此，在1955年，全社勞動效率比合作化以前提高25%，雖然遭受了百年未有的大旱災，由於副業開展得好，95%以上的社員仍然增加了收入。許多地方的農業社，舉办了農忙托兒所，使本來不能從事體力生產勞動的人也能發揮作用，并騰出能夠參加勞動的婦女參加了農業生產，更是有力的說明。

3. 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就可能較大規模地改革耕作技術和耕作制度，改良土壤，推廣優良品種，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過去分散的小農經濟，一家一戶守着一小塊土地，力量很

小，耕作技术很难提高，对研究、試驗各种农业科学技术，更是个体农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但合作化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在推广良种方面，根据全国1956年的統計，粮食作物的良种面积达到68,000多万亩，占全部粮田面积的36%；推广棉花良种面积8,400多万亩，比1950年扩大了7倍；在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絕大多数地方的水稻全部采用了优良品种，这更是單干时所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改变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据統計，1956年全国仅由于扩大双季稻面积，变旱田为水田、稻田，就增产稻谷120亿斤。湖南省醴陵县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提出并貫徹了“改單季为双季、改間作为連作、改稀植为密植、改低产为高产、培育良种、推广四勤八有”等一系列增产措施，到1957年，每亩稻田平均产量802斤，比合作化以前的1952年（每亩平均620斤），提高182斤。醴陵县赤竹社，全社129亩田，低产田就占了52%，每亩产量只有二、三百斤，1956年春天，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他們开展了群众性的改良低产田运动，在粘性重的田里挑含沙多的塘泥、小菜土，在沙性重的田里挑黄泥，开圳避去冷浸水，增施肥料、提高泥温等一系列措施，到1957年，每亩平均产稻谷1,102斤，变成了千斤社。

4. 合作化后，生产資料、生产資金都归农业社統一合理地使用，就可以較大規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設。如兴修規模較大的农田水利，征服水旱灾害，大規模地开展水土保持，綠化造林，改造自然。在个体經濟时期，因土地私有，劳力分散，各人利害不一，很难克服基建用地及劳动力的調配問題；同时，农民們看到較大的工程，也很难同样热心。只有实现合作化以后，才解除

了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束縛，才能較大規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設。如在合作化后的1956年，全国完成的水土保持控制面积达到66,300平方公里，等于解放后六年来的总数；造林面积达到469万多公頃，等于1955年同期的4倍多；兴修水利的成績更大，光算这一年的水利工程，就增加了灌溉面积15,000万亩，等于我国解放前历史上几个朝代水利設施灌溉面积的一半，等于解放后六年来发展灌溉面积的百分之二百。

特别是在1958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中，这种成績更为突出。据1958年3月底的統計，全国在短短的六个月中，新修农田水利工程共扩大灌溉面积27,000多万亩，每天平均扩大灌溉面积300万亩，等于解放前几千年所发展的灌溉面积120%，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增加的灌溉面积30%。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窪地治理和改善現有灌溉面积等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共改善原有灌溉面积达11,000万亩以上，据河南、河北、山东等十县的統計，并有236个县、市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这种惊人的速度，是任何历史朝代不可能有的奇迹，如果全国沒有实现合作化，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的。

湖北省襄阳专区兴修水利的經驗，更充分地說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說明由于实现了合作化，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襄阳专区各县山多崗多，雨量較少，原来水利条件很差，一般产量很低，全区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只200斤左右，棉花每亩产量只10多斤，是全省的低产区。該专区均县明星一社，过去当地群众中流傳过这样一首歌謠：“造孽莫过李家湾，湾后荒山，湾前河灘，不干就淹，吃不飽来穿不暖。”在实现合作化以后，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在社主任李大贵的反复站

研下，提出并实现了把河水引到山坡，把山坡旱地改为水田的计划。当年所改成的水田，每亩产量就提高到690斤，仅1955年到1956年，他们的水田就由过去的62亩增加到600亩，每户平均增加到4亩多水田。群众兴奋地说：“从前張李二湾光秃秃，现在住在田中央，祖祖輩輩荒坡地，变成稻谷黄亮亮。”原来要退社的也不退社了。李大貴的引河水上山的創举，在全县得到了大力的推广。

邻近的光化县吸收并发展了均县的經驗，他们根据实践的經驗，提出了“全面勘察、統一规划、远处引水、近处灌田、渠堰相連、常年蓄水、忙时用水”的办法，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打破了几千年来的陈規，把过去分散、孤立的渠、堰、塘、庫，連結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自流灌溉系統——西瓜秧式的水利系統。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可以把河溪里平时大量流失的无用之水引向山坡，使山坡、崗地、平原等各种地形都得到灌溉之利，大量的旱地都可以改为水田，改变了过去“山崗地望天收”的状况。其次，由于把渠道和塘堰連系起来，用时灌田，閑时灌堰，就可以把平时流失的水量儲蓄起来，大大地扩大蓄水量，把灌溉面积扩大到十几倍以上。再者，由于从高处、远处引水，变抽水、車水为自流灌溉，大大地节省了人力、財力。过去想要利用河水，总从建立抽水机站、筑大攔河壩方面着想，一动就是几百万元，要鋼骨水泥好多吨，还很难办到，现在采用这种办法，大量的水利工程都可以由群众自办了。襄陽專区的各县，充分利用了合作化的优越条件，根据这种办法，一个冬春就改了150万亩水田。群众都高兴地说：“有了合作化，干了一年就办了过去几輩子也办不到的事。”

第三、农业社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經營，就可以克服單干时

生产經營上的盲目性，全面进行較長期的生产规划，这对保証农业和整个国民經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克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分散的个体小农經济之間的矛盾，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許多高級农业社在建社之后，不仅制訂了当年的生产计划，而且也制訂了发展生产的远景规划。他們把当年增产计划和長远的基本建設結合起来，統一进行安排，既保証了当年的增产，又为長远的生产建設作好了准备。如山西平順县羊井底紅星农业社，在初办时，由于缺乏經驗，沒有全面规划，因此，农、林、牧三者之間，就发生了在当时看来是难以調和的矛盾，如放牧和造林爭坡，果园挤掉了粮食地，农民的零星植树和搞副业运输爭路等等。后来，經過討論研究，他們就成立了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員一齐上山，根据阴阳山坡、气候冷热、坡度大小、土壤好坏、溝边寬窄、植物习性等条件，本着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原則，一溝一片一坡一灘地就地勘察，就地研究，再經過群众討論，按照宜林者林、宜农者农、宜牧者牧、因地制宜的原則进行分类排队。这样规划的結果，不但为农、林、牧的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土地的利用率也比规划前提高了10倍。

制訂全面规划，不但使群众更清楚地認識了建設山区的意义，也使大家从这里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农村呈現出一片新的气象。他們用这样的歌声来贊頌未来的生活：“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干河打壩变平地，洪溝变成米粮川。家中副业养鷄猪，牛羊成群变宝山。山区全面建設好，幸福生活万万年。”由此可見，全面规划也是动员广大农民建設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推动农业生产走向高潮的重要条件。